

# POWER POLI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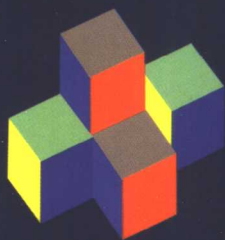
## 权力政治

[英] 马丁·怀特 著

[英] 赫德利·布尔

[英] 卡斯滕·霍尔布莱德 编

宋爱群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0113113

D 5  
58



\*201131131\*

# POWER POLI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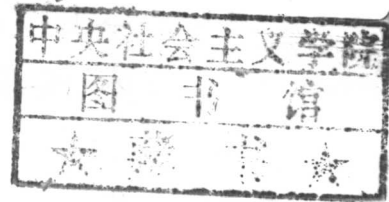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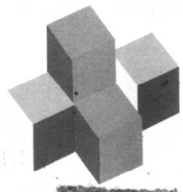
# 权力政治

[英] 马丁·怀特 著

[英] 赫德利·布尔

[英] 卡斯滕·霍尔布莱德 编

宋爱群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opyright ©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8

the Wor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中文简体字版 © 2004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政治 / (英) 马丁·怀特 (Martin Wight) 著; (英) 赫德利·布尔 (Hedley Bull), (英) 卡斯滕·霍尔布莱德 (Carsten Holbraad) 编; 宋爱群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7

书名原文: Power Politics

ISBN 7 - 5012 - 2303 - 3

I. 权... II. ①怀...②布...③霍...④宋... III. 国际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8754 号

图字: 01—2001—5053

## 书 名

权力政治

Quanli Zhengzhi

## 责任编辑

袁路明 杨连春

## 责任出版

夏凤仙

## 责任校对

陈可望

##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 经 销

新华书店

## 开本印张

787 × 1092 1/16 16 5/8

## 字 数

250 千字

##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 专家委员会

袁 明 时殷弘 秦亚青  
王缉思 阎学通 倪世雄

## 编辑委员会

姚东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勇 王 联 于铁军 张小明  
潘成鑫 袁路明 周宇君 夏力宁

## 本书译者

宋 爱 群

唉！朱庇特，这难道使你满意吗？  
为了日后永久的和平，  
民族间就应兵戎相见，杀得天昏地暗？

维吉尔

*Aeneid*, xii, 503—504

公民知识，最可能来源于物质，  
最难以化约为公理。

弗朗西斯·培根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Book II, xxii, 1

# 总序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

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惟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源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编译的这套书

中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源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 1991 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論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担纲这一套书翻译工作的主力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中已具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多次赴欧美日发达国



家深造和在外讲学、交流的经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体悟，既来自于书斋，亦得之于实践。翻译原著，其实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绝不是粗通一些外文便可对付得了的；要编辑出版成书，也有种种不易。直至今日，大部分译稿都已脱手之际，译者仍对文稿中的一些专门用语苦思冥想。因为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时的确无法将西方大师们思考的神貌用完全相符的中文语词表达出来。“难哉译事”，难是难在“神”上，而非“词”上。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受过两种文化的教育，现在又都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执教，他们在实践中交融了两种文化的优长，更深感要让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了解西方原著的必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有了这一套书。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的。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视野开阔，既看到了世界的过去，也想到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勤恳敬业，是支持我们完成翻译这套书的重要精神支柱。

袁 明

2002年10月

# 序 言

马丁·怀特所著《权力政治》一书的最早版本 9  
是 1946 年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出版的“展望”系  
列小册子<sup>1</sup>之一。尽管只有薄薄的 68 页，且早已绝  
版，但却对大学国际关系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英国尤其如此。马丁·怀特生于 1913 年，卒于  
1972 年。在他生命的最后 20 年里，他将该文的修  
改与扩展视为其最重要的学术工作。

不幸的是，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新《权力政  
治》未能完成的手稿是否应当出版，这成了不得不  
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该书某些章节只  
是草稿形式，各章节分别写于 20 世纪 50 至 70 年  
代的不同时期，与最早的版本不同，新手稿未能反  
映出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期对世界看法的一致性，  
而且也需要尊重马丁·怀特为自己所定的非常高的  
出书标准；另一方面，显而易见，除去结论部分，  
作者在目录中提及的所有章节至少已完成初稿。倘  
若考虑到马丁·怀特的著作重点强调国际关系中的  
连续性而非变化，引述当代事件皆为说明而非构成  
主题的话，那么该书不同的部分写于不同的时期便  
不能视作严重的缺陷。毕竟手稿的出版对于该专业  
学生来说价值巨大，这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

读者将看到本书对国际政治体系所做的经典描述 10  
述。这一体系产生于近现代早期的欧洲，后传至其  
他几大洲，今天仍旧构成国际政治的框架。作者的  
兴趣不在于引导人们认识当今国际政治中那些转瞬  
即逝的现象，而是明确阐述那些根本性的、持久的  
国际政治特点。作者在第一章中指出，希腊人的政  
治著述之所以成为经典，原因在于其相关性，其中  
论述的问题正是此后历代人所经历的问题。本书讨  
论的相关问题亦即于此。

本书用很大篇幅来界定并说明这种根本性的、  
持久的国际政治特点的实质内容就是国家 (pow-

ers)、支配大国 (dominant powers)、大国 (great powers)、国际革命、国际无政府状态、均势、战争与干预。然而, 尽管作者意在如此浓缩提炼历史经验, 却并未忽视历史经验本身, 其论点多有大量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而非抽象的表述。这不是一本史书, 而是对历史的思考, 但其依据的历史知识的可靠性毋庸置疑。本书语言简练、清晰而不做作、晦涩, 也未加任何自辩说辞或说明作者研究方法的前言, 而是开门见山, 直截了当地论述国际政治的实质问题。书中提出的观点既现实而又不乏人情味, 体现了一位学者对事实的尊重以及对道德问题的强烈关切与探究。虽然作者对此并未刻意表白, 但读者绝不会体会不到。本书不掺杂任何个人目的, 也没有丝毫学术上的矫揉造作, 其知识真实可靠, 这在同类作品中确不多见。

新版《权力政治》较之 30 年前最早的版本长得多。在实质内容上是否也有明显差异呢? 与原版本不同, 新版本反映出作者对军事技术如何影响国际政治这个问题的争议十分了解, 并且含有论述军备竞赛、裁  
11 军及军备控制的章节。原版本重在论述国家间的冲突, 而新版本对此作了修改, 加入了国际社会及其处理国家间合作问题的机制——联盟、外交与战争——的章节。新版本还包括一个有关国际革命的章节, 论述“横向”的, 亦即跨国的冲突与合作。与原版本截然不同的是, 目前的版本对中等国家的概念进行了认真阐述, 这一变化反映在它删除了原版本中有关小国的章节, 代之以论述次要国家 (包括中小国家) 的章节。

然而, 如果考虑到自 1946 年以来, 国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学术研究的方法所发生的较大变化, 新版《权力政治》的突出特点在于: 它与原版本无论在风格还是实质内容上均相差无几。30 年世事的变迁——冷战的兴衰、核武器的扩散、欧洲帝国的解体以及第三世界的出现——促使作者重新举例说明, 但其基本观点和根本目标依然如旧。30 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大量增加也未能明显改变作者的立场和研究方法: 他对行为主义者、战略分析家 (零散提及除外) 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著述不予理会, 而这些在当今被称为本学科的标准文献中均占有突出地位。

这种对变化、对理性方式无动于衷的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本书分析论证的弱点, 又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它的长处? 如果我们将新版《权力政治》同当今西方世界出版的大量国际关系基础研究著作进行比较, 它或许在五个方面表达了该学科的一种极其清晰、深刻、颇具学术

价值的观点，但却不是以现代方式表述的。

第一，可以这么说，新版《权力政治》的基本观点同原版本一样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确，作者指出，继日本取得大国地位后，出现了一个已不再是欧洲的、而是全球或囊括各国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欧洲优势业已衰退；早先的殖民地国家已经崛起，并利用联合国作为他们的工具；欧洲国家和日本集体干预 1900 年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sup>2</sup>，从而标志着“世界历史当代阶段的开始”。 12

但是，当作者说“我们也许可以将世界大国界定为一个能够在欧洲内部有效行使来源于欧洲以外的实力的大国”<sup>3</sup>时，他似乎忽略了欧洲已优势不再的事实。这一定义只有在回顾历史，将其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国际体系时方可被接受。在论证的某些部分，如关于联合国的章节中，怀特似乎未加批判地接受了作为西方国家政策基础的价值前提，而且对第三世界国家声称自己是在进行一场反对统治的正义斗争的说法也未予重视。作者对“权力政治”的论述是对西方国家体系经验的提炼，但却没有探询人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这一经验来理解一个多数成员乃非西方国家的国家体系。

与马丁·怀特的分析不同，关注当代问题的分析将后者作为主要问题对待。鉴于非西方民族的历史经历大多不属于西方国家体系范畴，或者确切地说，不属于任何国家体系范畴，那么根据西方历史对权力政治所作的种种概括，人们又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今天这些国家的行为呢？鉴于当代国际社会的准则与制度皆由西方国家为促使实现西方目标而建立，那么对于未能参与制定这些准则与制度的亚洲、非洲及大洋洲的新兴国家来说，它们又具有多大的约束力呢？

不应忘记，尽管今天的国家体系是全球性的，其成员多半为非西方国家，该体系本身是一个西方体制，或者说是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外交程序、国际法的形式、国际组织，甚至国际社会新成员处理对外关系时所使用的战争和谍报方式也是承袭西方占统治地位时期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当今全球的国家体系仍然以欧洲为中心，这是西方对世界其他国家影响的重要标志。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国家的增加标志着欧洲亦即西方在世界统治地位的下降，但它至少暂时也标志着欧洲亦即西方的通行政治组织观念的胜利。 13

在下文提到的《国家的体系》一书中，马丁·怀特认为历史上所有

国家体系均以共同文化为先决条件，并明确地捍卫这样一种论点，即现代国家体系乃西方或欧洲经验的产物（尽管已故的 C.H. 亚力山德罗维茨教授曾对此提出质疑）。<sup>4</sup> 如果情况确系如此，那么我们要问，当今全球的国家体系是否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上？如果不是，那么它是否有望生存下去？当今国家体系是否因为扩展超越了原先欧洲文化的基础而正在瓦解？它是否在所谓现代化的世界文化中又找到了新的基础？马丁·怀特的著作有助于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尽管他自己没有直接予以回答。

第二，新版《权力政治》仍与原版本一样，认为世界政治主要包括国家（powers or states）在外交方面的相互关系，而当今这方面的研究多半则认为，国际政治舞台是由国家与“其他行为体”诸如阶级、政党或商业公司分享的，而且对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来说，这些不同集团之间跨国关系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现代人一般对国家比对教会、阶级或任何其他国际联系表现出更强烈的忠诚”。<sup>5</sup> 事实也许如此，也许并非如此，但是现在的学生如果要提出对于忠诚对象的另一种解释，则至少必须认真研究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泛非、泛阿拉伯、泛伊斯兰运动，或者世界许多地区的民族或种族团体的主张。

然而，尽管作者没有以具体的当代思维方式论述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但他的著作中通篇贯穿着这样一种鲜明意识，即国家的地位，因而国家体系的地位是无法预料的。他指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国家体系是通行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将它看做正常现象不过是一种错觉。<sup>6</sup> 他宣称，尽管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和直接成员，但其最终的成员是个人。<sup>7</sup> 在关于国际革命的章节中，他指出，近现代社会的三次伟大革命——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揭示出人类社会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但同时也造成超越国界的裂痕。他辩驳了这样的假说，即这些“横向”分歧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的革命时期是特殊或非正常现象，而国家之间的“纵向”分歧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的非革命时期则是通常规律。他指出，在近现代世界史中，前者与后者两种情况几乎各占一半，认为其中之一是“正常”现象不过是表达了自己对未来格局的倾向罢了。<sup>8</sup>

马丁·怀特在《国家的体系》中探讨了现代国家体系的传统边界与

地理边界，并论述了存在于这些边界之外的通行政治组织的替代形式。<sup>9</sup>在其未出版的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讲稿中，他将跨国关系亦即“横向”关系作为与国际冲突、国际合作（交往）同等的国际政治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sup>10</sup>事实上，他的著作没有低估国际政治中跨越国界即“横向”关系的重要性，而是帮助我们看清目前这些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并不新鲜，并非前所未有的，它可能不如以往某些时期那样重大，但那些现在鼓吹跨国联系与分歧比国际联系与分歧更重要的人们所表达的是近现代时期反复出现的主题。

第三，新版《权力政治》与原版一样，基本论述的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很少谈及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换言之，它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论述比较笼统；在这方面，它与目前研究这一问题的流行方法格格不入。无论我们考虑的是富国相互之间的贸易网络、货币和投资关系，富国与穷国谈判涉及的发展援助资金的安排和财富分配问题，还是穷、富国共同表现出的对于获得或者开发稀有资源问题的高度关注，显而易见，目前国与国之间，或者泛泛而论，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的交往多半属于经济性质。而且，现在经常有人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政治问题相对于经济问题而言已变得不那么重要，要不则认为（也许这更准确），尽管国际政治依旧是主要问题，经济已成为国际政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其重要性相对于军事和战略问题已经增加；在国家之间为攫取权力、扩大影响的竞争中（如果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国际政治），经济目的和手段变得更为突出，而军事目的和手段已经不那么突出了。

我们还应注意某些国际政治的论述在今天所具有的影响，这些论述不仅坚称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而且认为经济因素对事件的发展比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性的作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引证列宁从经济帝国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列强竞争所作的经典阐述，而且还可以引证新马克思主义或新列宁主义理论以“结构性依赖”或“新殖民主义”来阐述贫、富国家及其贫、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这些理论以经济因素解释国家的区域性政治一体化，或者将经济与技术相互依存形容为世界上一股新的革命力量，它导致国家体系的彻底变革，可能还会导致其衰落或者过时。

的确，在本书中，马丁·怀特并未试图驳斥这些论点，他对此做何

回答，我们或许只能猜测了。他无疑看出政治是国际关系中的主题，并且也会否定经济主题已经取而代之的说法。同样，他肯定也相信所谓的国际政治自治说，不会赞同将经济进程作为世界历史中的根本因素，而将政治进程作为次要和衍生因素的论述。

他没有必要在其论题中否认经济收益是政治斗争的目标（如为控制资源和获得原料而进行战争），或否认将经济手段作为此类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拒绝提供能源、食品、或原料以迫使对方做出政治让步）。政治考虑第一的论说也并未因承认下述观点而受到削弱，这就是在 19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互不相干，而到了 20 世纪，两者关系密切起来，如同在 17、18 世纪重商主义思维的时代一样。

- 17 但是，认为国际经济正在一定意义上取代国际政治，以及可以用某种方式绕开或不予理会世界上争权力和影响的斗争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国家不时出现这种看法），在怀特看来，则肯定是基于一种既浅薄又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关于人类困境的认识。而且，他当时也可以指出，国际经济胜过国际政治的观点在现代国际关系思想中反复出现，它因当时当地形势的暂时特点而显得貌似有理，正如 20 世纪它以科布登主义的形式出现于英国一样，而当这些暂时情况消失后，国际政治优胜论便以迅猛之势卷土重来。

第四，部分因其书名和内容的缘故，人们肯定会将《权力政治》与所谓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政治论著联系起来，这些论著主要盛行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及 40 年代，此后便不再流行。现实主义作者被称为流派是极不准确的，他们形成自己的观点以回应 20 年代及 30 年代初将希望主要寄予国联的理想主义，亦即进步党思想。早些时候的思想家将“权力政治”称为以往国际惯例中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特征，现在可以也应当加以批驳，或者称它是某些恶毒、桀骜不驯的国家的外交政策才具有的特征，而现实主义者则将“权力政治”看做主权国家之间所有关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固有的特点。

过去 30 年来，大量批评意见都是针对这类国际政治的论述。那种认为任何国家的国际行为均可从攫取权力——不仅作为手段，而且作为外交政策目的——的角度来解释的理论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证明为简单化的理论。认为某个特定国家例如美国的外交政策行为可以从国家、大

国、支配大国、世界大国行为的普遍规律来理解的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的政策不仅是国际形势而且是国内形势的结果，国家体系中的国家数目（例如，与任何一国的公民人数相比）是相当少的，因此，不可能通过笼统概括，而是应当通过了解每个国家的具体特点才能最好地理解它们。

用“权力政治”阐释国际关系不符合这样的事实，即某些国家集团（如现在以各自不同方式形成的英语国家、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欧洲经济共同体、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不仅反映出为反对外来敌对势力而存在的外交同盟，而且反映出存在着多国政治共同体，它们导致各自的成员国在相互关系中按照非“权力政治”的规律行事。此外，国际政治乃“权力政治”的理论或许还依赖于目前受到普遍质疑的观点，即外交政策的执行是“合理”且目标明确的。现实主义著述原本所反对的国际进步的学说在当今有关未来世界秩序的“政策导向性”研究中再次出现，在这些研究中，现实主义观点遭到抨击，理由是它们不道德，而且使描述问题与解决问题、了解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的界限过于分明。我们无须在此考虑这些以及其他批评意见对国际政治乃“权力政治”的理论一定就是致命的。但我们可以说，如果现在有意重申或者恢复我们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立场，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些批评做出回答。

但是，将马丁·怀特的立场说成是现实主义的立场是否合适，可能还有疑问。他将自己的著作称为《权力政治》，是因为考虑到该书论述的是大国政治，亦即不承认任何高于自己的政治权威的独立政治单位的政治。<sup>11</sup>他明确否认这种政治可以与霸权政治（*Machtpolitik*）、亦即武力政治（*the politics of force*）或“通俗意义上的‘权力政治’”相提并论。<sup>12</sup>与汉斯·摩根索不同——摩根索所著的《国际政治》（1948）是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著作，至少在学术界如此——怀特没有自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该理论基于这样的观点，即任何外交政策都与谋求被界定为权力的国家利益有关。与E.H. 卡尔不同——卡尔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对他产生过影响——怀特没有将自己的立场称为现实主义立场，或将此作为替代乌托邦主义的选择，或寻求去利用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与乔治·凯南不同——凯南的《美国外交》（1952）试图用现实主义观点引导美国外交政策——怀特没有抨击“道德主义”，或认为他的分析提供了一些实际



教训。

怀特以一种试探、询问的方式提出大国政治表现为权力之争。在第一章中，他提出这一观点作为一种工作假说，“其价值在于指出国际关系中一个主要事实，即便它使某些其他问题变得模糊不清”；<sup>13</sup>在最后一章，他又重新回到这一观点，以说明被它搞得模糊不清的事情正是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及它们的共同道德义务传统。<sup>14</sup>在其尚未发表的国际关系理论讲稿中，怀特是从以下三方之间辩论的角度来阐述国际政治的，即强调国家之间冲突的现实主义或马基雅维利主义论说、强调国家之间合作与交流的理性主义或格劳秀斯论说以及强调人类团结和统一的革命的康德主义论说。在这些讲演中，他显然没有接受现实主义的立场，而是认为，不应从这三种解释的任何一方，而应当从它们的辩论和论证中寻求真理。<sup>15</sup>

因此，怀特对现实主义立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在《权力政治》中，他与其说是系统阐述这一立场，不如说是表明这一问题发人深思。20 他这样做并非打算提出一个缜密、系统的理论；确切地说，他对国际政治领域中所有的此类理论都抱有怀疑和反感。

第五，可以这么说，新版《权力政治》几乎或根本没有接受自原版出版以来累积发表的关于该问题的学术论著。作者没有设法预防任何熟悉这些著作的人自然会提出的某些指控，并予以反驳，为自己辩护。他承认没有必要将自己的论点与学生应该熟知的近期著作联系起来。他也没有考虑关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问题而进行的辩论，尤其是没有寻求去抨击所谓的行为主义，亦即社会科学学派，后者的批评对象恰恰是诸如《权力政治》这样的著作所使用的方法论前提。

马丁·怀特对有关该问题近期文献的无动于衷或许可以被看做本书的缺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是本书力量的源泉。国际关系是这样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中，不能认为新的研究代表着比以往研究进了一步，也不能认为书籍和杂志的大量出现是学术进步的标志，或者说学科大师对该学科的最新著述了如指掌。尤其是在像本书这样一部寻求论述国际政治制度根本性的持久特点、而不仅仅是其目前状况的著作中，阐述问题必须依据该学科的经典表述而不是近期文献，其意义在于这些经典论述是该学科某个特定观点的标准的，亦即最出色的表达方式。

我们认为，马丁·怀特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即在这一意义上，